

江西中医药大学姚荷生研究室组织整理

近现代名中医未刊著作精品集

脏象学说与 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 ——脾脏、肝脏、肺脏



姚荷生
潘佛巖 编著
廖家兴
姚梅龄 校注主审

近现代名中医未刊著作精品集

脏象学说与

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

脾脏、肝脏、

编 著 姚荷生

潘佛巖

廖家兴

校注主审 姚梅龄

校 注 张光荣 李清

孙寅翔 何秉儒

匡艳红 谢娟

张政杰 吴炫静

部爱贤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脾脏、肝脏、肺脏/姚荷生,潘佛巖,廖家兴编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近现代名中医未刊著作精品集)

ISBN 978-7-117-17962-1

I. ①脏… II. ①姚…②潘…③廖… III. ①脾病辨证-研究②肝病辨证-研究③肺病辨证-研究 IV. ①R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6410 号

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 在线购书
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 医学数据库服务, 医学教育资源, 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

——脾脏、肝脏、肺脏

编 著: 姚荷生 潘佛巖 廖家兴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9 号

邮 编: 100021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59787592 010-5978758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张: 10 插页: 1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7962-1/R·17963

定 价: 32.00 元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59787491 E-mail: WQ@pmph.com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退换)

出版者的话

在我国近现代中医界曾经活跃过一大批学验俱丰,在当时享有盛誉、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医大家,或蜚声全国,或名重一方,为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在临证之余也多有著述,然而,其中许多著作(如手稿、内部交流稿等)因种种原因在作者生前直至现在都未能出版,以致先贤在长期临床实践和寝馈深思中积累的宝贵学验被埋没、被遗忘,甚至有的已经失传,这应视为中医事业的一种损失。如以“作者生前其作品未能刊行”初步确立未刊的定义,历史上许多名著在一段时间内都曾经是未刊作品,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是一例,因此,中医界的未刊著作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诚然,以实事求是和谨慎客观的态度来考察和分析我社编辑目前搜集到的未刊著作,不能说每一部都是精品,但其中不乏有重要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价值者,它们凝聚了先辈一生的学术精华,尊重它们、珍视它们,进而出版它们,是中医编辑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为此,我们策划了“近现代名中医未刊著作精品集”丛书,拟将上述作品在精选的基础上分辑出版,以飨读者。精选的标准为:作品应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价值,其学术观点及临证经验等,系经过作者当时长期的临床检验才得以提炼,既来源于临床实践,又能很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以目前的中医发展水平来衡量,仍有其科学性、独特性、实用性,对中医工作者和学习者有重要参考意义,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为确保以上目标的实现,我们对符合上述目标初步入选的作品又分别报送当前中医界知名专家评审,在专家的具体指导下确立最终书目。

鉴于许多中医名家的未刊作品多在其弟子或家人、友人处,另有部分保存在中医临床、科研机构或各地图书馆当中,故殷切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提供有关稿件及信息,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一批批的未刊著作得以问世,使先贤英名不朽、学验流传、德音累属、慈惠无穷。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年9月

不丧斯文是天意

——代序言

孟庆云

自古以来，经典名著多遭危难，医药之书也如是。《汉书·艺文志》记有医经七家仅存《黄帝内经》。而其中的《素问》到唐代王冰整理之际，已缺第七卷了。《神农本草经》亡佚已久，现在仅能读其辑佚本了。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经过王叔和整理后，又多次离析散乱，至今我们仅在能见到《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二书中，方可约略得识平脉辨证论治的髓旨，深感先师之博慧精诚。近日，我以先睹之幸阅读姚荷生、潘佛巖、廖家兴三位先生合撰的关于脏象论的残卷，深感此书既有当代经典的学术价值，而其传世梓行又有如同古代经典面世的曲折多舛。我尚不知对此残篇的整理者姚梅龄教授等诸君对书的命名和详细经过，不妨称其为《脏象遗篇》。

明末三先生之一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论及中国古代学术的治学规律是：“学成于聚，而新故相资新其故。”这也是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模式，如中医理论核心的藏象，从《内经》莫立以后，就是沿着“新故相资”的发展路线臻善演进的。

《内经》对于藏象理论当是第一次整理和总结。《素问·三部九候论》记有“神藏五，形藏四，合为九藏”的说法。《素问·六节藏象论》也有“九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也。”在历史上夏代重“九”，言事以应“九”，如九野、九鼎，人体脏腑以应九，当是孑遗。周人尊“八”，《灵枢·九宫八风》篇有应八方八风的八卦藏象，尚没有脏与腑的层次之分，其类分的依据如《易纬·乾凿度》所说：“以应律历之数”，“人生而应八卦之体”，《礼纬》也言“八风象八卦”，是医家援用易理之八卦为医理的体现。这一理论思路在讲术数的方士和医家中也沿用很久，在《内经》一书中如《素问》之《八正神明论》，《灵枢》之《九针》、《岁露》等篇，皆论及八风。八卦藏象导源于“近取诸身”和占病：胃应巽卦，

位东南，应立夏，弱风。心应离卦，位正南，应夏至，大弱风。脾应坤卦，位西南，应立秋，谋风。肝应震卦，位正东，应春分，婴儿风。肺为兑卦，位正西，应秋分，刚风。大肠应艮卦，位东北，应立春，凶风。肾为坎卦，位正北，应冬至，大刚风。小肠乾卦，位西北，应立冬，折风。八卦藏象的特点是脏与腑尚无层次之分，有律历特征的时间结构，每一脏腑单元应三个节气即45日，有八个方位和风候。所依据的是古老的星历。八卦藏象又与占式有联系，1978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了“太乙九宫占盘”，当是依据此理的术数推算的实物。其最主要是为“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之用。

秦代(战国及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朝)及汉朝之初，崇“六”，《史记·秦始皇本纪》：“数以六为纪”，汉初贾谊“以六为法”、“六则备矣”。医家合于术数，脏腑以应六，《素问》有《六节藏象论》。除此论之标题外，论中有“藏象何如”之语，由是而有“藏象”一词。称“藏”者，是指居于体腔之内的脏腑，皆系“可解剖而视之者”，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器官。称“象”者，是《周易·系辞传》“立象以尽意”、“象其物宜”之谓。即见诸事物，蕴生观念是谓象。象，起于上古对动物的图腾。当时华夏大地，气候湿润温暖，现今从河南到四川的地下，每每有丛聚的象牙、象骨出土。对象的巨体和灵性的崇拜，把所见而印象深刻的景物称之为象。在《周易》的占筮中，把显示的龟纹和蓍变的图样称卦象，把仰观于天的星气所见称天象、星象、气象。由是而把形见于外者皆称象。古人既以“易为天地准”，以易道为医理，在“以制器者尚其象”的取道中，必然要探讨“五脏六腑各有所象也”(《孝经·授神契》)，遂有藏象之论。

《素问·六节藏象论》言人有六藏六器，六藏是五藏加上一个称“器”的藏，但这个器有六：“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这里的六藏是按《易传·文言》将一年十二月分配于六爻，称六节，每节按周历为两个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论六节之藏对应的季节是按三阴三阳分的，即：肝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六器为至阴，即阴中之太阴，通于土气，也即地气。此论把胆列为六藏之一，论中没言其在三阴三阳之分属，但在《素问·阴阳离合论》中有所论，胆当是阴中之少阳，和六器的通于天气相对应，应是通于天气。既然诸气都是由天气决定的，胆通于天，于是《素问·六节藏象论》言道：“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历代以来，王冰以“中正刚断无私偏”为注；李东垣以“胆主少阳春生之气”解也不惬意；少阳为枢而取决于





胆也是后世的解说。既然此论中胆与肝并列，而肝“通于春气”，则春生之气统全年就非胆之专利，“通于天气”才能取决十一藏，当然也包括胆藏自身。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残卷《明堂五藏论》也重视胆，说“胆者，敬也。”（法图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编号 3655）《素问·六节藏象论》言十一藏也是深合术数的，《汉书·律历志》言：“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王夫之在《周易外传》概此论曰：“而黄钟之数十一，则天五地六之一数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吸收了《灵枢·九宫八风》八卦藏象的论藏的卦义，如肝为震木、心为离火、肺为兑金、肾为坎水等，但对于“器”藏则是除脾藏外还包括其他五者，脾在《灵枢·九宫八风》篇中为坤土，而《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六个属于“器”的，即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它们“通于土气”。六节藏象虽然依六爻“取道之象”，但非八卦藏象之以占为诊，并发挥发展了“象”，扬弃了占。其阴阳一分为三的思想，也见诸《素问·阴阳离合论》等篇幅。六节藏象除以三阴三阳类分又应季节之外，还讲“本、处”（如心为生之本、神之变，肺为气之本、魄之处等），论“华、充”（如肾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肝其华在爪，其充在筋等），应“色、味”（如肝其味酸，其色苍；器其味甘，其色黄等），可知六节之藏已各为一个系统了。

最早论及五藏的是《管子·水地》篇：“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先民尊五也有悠久的历史，并创发了五行。远古的农牧需要，观五星定季节始有五星的图腾，后又联系物质有五材之论。《史记·天官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五行的理论首见于《尚书·洪范》。把五行和脏腑结合又论及五行相生的也首见于《管子》，有《幼官》、《四时》、《五行》和《轻重己》等篇。《左传·文公七年》已按五行相胜出列顺序：“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逸周书·周祝》：“陈彼五行，必有胜。”至战国，齐之邹衍有五德终始之论。《吕氏春秋》有系统的《五行相生》与《五行相胜》之论。五行有多种排序：天文学家按时序以木位为先，木火土金水，也是相生之序；道家以天一生水为先，循河图式排序，即水火木金土；炼丹的方士，以金为主，金木水火土。战国之际，五行已有数派。其后主要有相生派，代表人如刘向；相克常胜派，代表人如邹衍；兵家墨家的无常胜派。五行理论和藏象结合，为藏象增益了丰富的理论元素和生机。

先民重视五，以五为数并非偶然，《史记》和《尚书》都指“数”为“天数”、“大数”，《素问·玉版论要》篇称“道之至数”。杨上善释言“数，理也”。冯友兰指古人以数为天机，周翰光认为“数”是概念方法。《史记·日者列传》言：“人取决于

五行者也。”人有五官、五指及五趾、五藏等。殷商时已经有地有五方的观念，古代术数家以五为易数变化之魂，从数学而论，事物形成完整循环不少于五个，其生克关系为几何学上的五重对称，五行是可表述生命机理的最简捷的数学模型。远比用四的四元素、四体液更有生机。《汉书·艺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内经》把五行与藏象相结合的五行藏象论以此成为藏象的主体理论。

《内经》的五藏，以其比象取类论及生理，又以生克制化解说和推演病机，其理论也不断调整。例如五藏和五行的对应，在古文经学是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除肾以外皆与《内经》传本大异，这在《周礼》即有记载，而《内经》诸篇所记者，源自今文经学的记载。元代吕复说《内经》“萃于汉儒”，其言不诬。《内经》中很多篇及其论中的文字，出自先秦，汉代刘向和李柱国，当是第一次整理者，这次整理特点之一，是尽量保持原文原意，特点之二是合宜实际与实践，特点之三是解说之语用当世之语言。《内经》论述五藏的诸篇，如《灵枢·本藏》、《素问·五藏生成》、《素问·五藏别论》等，就是从“五藏之象”（《素问·五藏生成》）而立论称谓“藏象”的。

《内经》藏象之“象”，如《周易·系辞传》所谓“象也者，效此者也”，象既包括解剖的实体所见，更主要的它是气血运行于体的表象，如《素问·五藏生成》所说，是“五藏之气”现于外，可以指别、可以类推、可以意识、可以目察的象。其象主要有现象、意象、法象三者。现象者，直观可阅者也，包括解剖而视之者。意象者，乃心意营构之象，包括司外揣内、因发而知受、比类感知者。法象者，效法于天地、四时、气化、物理、易理。如此而言，五藏之象，既有解剖所见，又见诸功能；既为器官之原型，又超越原型实体。诚如《灵枢·本藏》所说：“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运四时，化五节者也。”

《内经》之五行藏象，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是取象论藏，超越实体。它是在五脏器原型基础上，又增益以象内容的理论模型了。可谓真而不尽实，虚而不为假。

二是为契合五行的比类系统。五藏以五行大义为主旨，五脏和五方、五时、五味、五色、五体等，乃至经络、六腑，按五行的五种势力形势，构成性能状态的五大系统。

三是应同宇宙，全息同构。言人体自是一小宇宙。人的五藏，乃是天人相应与天地相参的五藏，和日月五星宇宙之物有应同，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与西医学重视形质性大异，藏象认为人体之局部与整体的同构体，又有自相似性，局部有整体的缩影，称“全息同构”，所以





如是，乃人体之五藏体系使然。

四是四时五神，藏气法时。藏象是有生命活着机体的象。五藏皆主神，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五藏有阴阳的属性，又有时间和空间的属性，特别是在一年一日之内，各藏均法其时，堪为养生治病之要。

五是乾坤之道，整体生成。藏象乃乾坤之道，《周易·系辞传》谓：“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藏象之象和功能是乾坤一体各不孤立。象诸多见诸气血运动，是为五藏生成。又是起始即为整体而不断壮大，是生成论的整体观，而非构成论的整体观，这就论述了生命是整体层次的物质运动，是不可重复的、不可还原的，如《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

《内经》之藏象奠基了较系统的理论以后，随着临床实践和理论资源的丰富，对藏象一直在阐释、补充、发展。有以注释为发明者，自齐梁间人全元起首撰《素问训解》、唐王冰次注《素问》以后，其释文注语，多有阐发。例如王冰壮水益火之说和引火归元等，即是以注疏形式对藏象的发展。也有以精辟的概括而发展藏象的，例如“肝主疏泄”语出朱丹溪，“脾主运化”语出张介宾，此二语都堪为准经文。中医学派甚多，但理论上有着共同的本源，非《内经》学派的著作也不断增益藏象之论。例如《难经》和《中藏经》当是扁鹊学派的著作（见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扁鹊一派有扁鹊、子仪、仓公、华佗诸人，称藏府而不称藏象，但《难经》对脏腑解剖记载详细独到，又提出左肾右命门、三焦有名无形等，其五脏虚损之治，卓有临床价值。仓公则发展了五藏五色诊和写形，《华佗中藏经》则“第一次以脉症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病症”，“把脏腑辨证的理论系统化”（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南北朝的《褚氏遗书》，《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李时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当时已有多种名为《五藏论》的专著。宋代医学家对中医理论最为重视，很多医著把藏象列为首篇。金元医家对藏象理论有卓著的突破，刘完素以35年的时间研究《素问》，发现在后补入的运气七篇中的病机和气化理论中的藏象，已经对原有篇论的理论有所突破，对此他又有更新的识见，遂著《素问玄机原病式》，指出五藏有升降出入开合的气化功能；又指出五运和六气作用于人体后，致病的关键是“根机于内”，由病证的表现可知受病之藏和致因之邪，以此发展了“病机十九条”，创立了脏腑病机之学。同时提出升降出入，是因各脏腑器官体表都有玄府为之启闭通行。张元素则系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用药法式。其弟子李杲则在所著《脾胃论》中发展了脾胃理论，指出脾胃主人身之元气，脾胃为元气升降的中枢，又指出脾气不足，阳陷阴中，则为阴火。此阴火的

理论,是在治疗有火征象或长期低热,或外感重证后长期低热的治疗实践的经验升华而形成的理论。朱丹溪对藏象的突破是,继钱乙与刘河间以人身也有相火之说之后,提出相火寄于肝肾的相火论,以此开辟了虚热和杂病治疗的新途径。

五藏的理论无论从功能的覆盖还是生克机制的阐释,远不足以临床对理论的需求,更不尽于理论的发展。明代温补学派创立的多种命门学说就是对《内经》五藏的突破。《难经》的右肾命门,突破了《内经》的眼目命门,并有脉法之应。宋代理学家和道教学者都著力于太极图和太极理论的研究,朱丹溪首次用太极的概念解读生命特征,如是心为君主之官的理念受到动摇。何况按五行学说的五藏都是互有生克并列的藏。而在朱丹溪之前的医家对命门已论有殊异:北宋纪天锡在《集注难经》中,已言及“受胎始于任(妊)之兆,惟命门先具”;南宋陈无择之《三因方》将心肾配君火;金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以“右肾命门为小心”,等等。基于医家们集中了命门的多种重要功能的理念,明代医家创立了命门学说。最为突出的是温补派医家的三种命门模式,即孙一奎的动气命门,张介宾的水火命门,赵养葵的君主命门。这样,在五藏的更高层次上,除了道家和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主的一派理论之外,又有一主宰五藏的命门。此学说把人体生机衰微,免疫力低弱,阳虚已甚的病证,五藏机能皆低下者称命门火衰。

清代医家对五藏的创新远远弱于温病之学,藏象研究可资堪论者仅有王泰林之治肝,汪琥之养心(《养生君主论》)和吴门医家华岫云、罗浩的脾胃分殊之论等,朴学家对《内经》藏象的训注也令后人称羨,倒是藏象理据的考据源流值得推重。

晚明的学者已认识到“器”的重要。顾炎武说“非器道无所依”。王夫之更是强调象是取道之象,“至常者也”,象对气和器是值立相济关系,称“象者气之始”,“无穷者何也?阴阳形器之盛”。宋明理学以后,重道轻器,脏腑的解剖知识增益缓慢,藏象理论对以手术操作治疗内脏疾患,理论上的支持不足,清代外科和产科已经落后了,甚至有的技术失传了。在内科治疗领域,也期待补足器官解剖的知识,以充实医生对实体器官病位的把握。由是而有王清任《医林改错》的甫出。王清任在北京的医所称“知一堂”。此“一”字,是“道在于一”之谓,也涵功能与结构一致之意。清末的医家对《难经》的注释著作大增,如袁崇毅(进之)、童圣功、力钧(轩举)、龚迺疆(子封)、任锡庚(修如)、邬肇焜等人,均曾撰注过《难经》,其著书意图之一,是冀以通过对《难经》解剖内容的增补以发展





藏象理论,但未能达其意。清末民初的汇通派,也拟以西医脏腑解剖之注疏方式补藏象理论之未逮,也终注而未疏、汇而未通。究其原由,是因藏象一有据解剖所见内藏之现象,二有扬弃易卦的规定性而立象以尽意,三有外揣推理的应象,四有藏气法时的比象。可谓博大精深。对此当有全面的系统的理解才是。

在本书作者著述的20世纪60年代里,当时虽然已有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的认识,但当时中医学潮洪流的主旨,是认为中西医结合是“惟一正确”的。1962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署名“湖北省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文章,题为《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其文观点明确,富有新意,理论深邃,一时激起对脏腑学的研究和多家杂志的专题讨论。有支持该文“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核心”的论点者,有认为经络才是核心者,有认为应补充为“脏腑经络”者,有反对以脏腑为核心甚至认为无所谓核心者,本书的作者姚荷生等人则强调应称“脏象”。基于这一背景,当时中南区卫生部颁立了“脏象学说的文献研究”的课题。这是当时中医界仅有的几个国家级课题之一。课题派令给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姚荷生承担。姚出身于中医世家,已历十一世,在江西有“无姚不成医”之誉,30年代参与组建“江西中医专门学校”,1950年担任全国首家中医院称“江西中医实验院”业务院长,并亲手创办《江西中医药》杂志,1980年以后任江西中医学院院长,著有《伤寒论证候鉴别诊断学》、《伤寒论疾病分类纲目》、《伤寒论难解条文》、《四诊概要》、《证候简释》、《脉学中的一般问题》、《脏腑辨证》、《病因辨证》等,曾担任《中医诊断》、《伤寒论》、《中医内科学》等课的教学工作。50年代全国中医防治乙脑协作组分两组,一组由蒲辅周任组长,另一组即由姚荷生任组长。蒲辅周先生对姚荷生的学识和干练极为赞赏,称其为“少壮中医”、“后生可畏”。卫生部曾三次下达他晋京的调令,均被江西省挽留。姚荷生先生在接受此书的研究任务之前,在1959年就曾完成篇名《脏象学说的文献探讨——肝脏》,此篇现为本书内容之一。课题之全书,在“十年动乱”前已杀青,但因于动乱当时不仅没能结题,而且资料卡片及初稿散失殆尽,其中的“肺藏”与“心藏”失窃,现只剩三脏的内部铅印稿,错字连篇,已经姚荷生的哲嗣姚梅龄的团队用两年的时间认真校勘。本次出版的即是五脏中没心没肺^①的三脏了。

本书原初虽是以文献研究立题,但早已超越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训文字的文献资料的层次,实际上是以五脏统六腑,站在现代人的高度与视域的全

① 姚梅龄:肺脏文字今已觅得,幸甚。

面研究,以全面性、系统性称著。他们参引了古今 500 余种著作,论及了源流、发展及当代认识,达到了“前人未及,后出转精,集其大成”的初衷。著作深入讨论了历代以来关于藏象理论渊源及难点、疑点,诸如命门、三焦、伏梁等诸问题,具有学术思想史的层次和价值,很多解读令人茅塞顿开,引发思路。本书最为耐读喜阅之处是,从生理解剖、病理和诊断治疗三个方面阐述藏象,联系临床又结合以作者经验把理论文献著作撰成一部临床实用的书。姚荷生先生的两个协作挚者潘佛巖与廖家兴都是江西中医药研究所文献室的资深研究员,都有多年临床经验、西医学知识和深湛的文献功底,在此著作参与之前,已经以其发表多篇论文展示其才隽和学风了。

书能有三卷之遗存,已经很幸哉快慰了,读过此书后,深感“天不丧斯文”之至真至实!陈寅恪先生曾曰:“后世相知或有缘”,我有幸、有缘。谢谢三位前辈的遗产,也谢谢姚梅龄教授命我为序。我认为,此书诚是传世名篇。

2012 年 2 月 1 日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前 言

本书是中医药专业人员的必读之书。因为它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医药学科核心基础理论的书，也是奠定中医药各学科分支应用基础的书，同时还是一部与临床及研究实践直接衔接并对其起着指导作用的书。学习这部书，不但可以全面系统深入地夯实中医药各类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而且可以大为拓宽我们的思路，从而大为提高临床、科研和教学的水平。

本书的基本内容为：各脏腑的解剖、生理（包括与自然的关系）、病理及其在诊断上的应用。其中脾、胃、肾与膀胱均很完整，肝脏则较为简单。

从系统性和完整性、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理论与临床实际结合的紧密度、专题研究之多与解决的理论争论之多等方面而论，本书属前无古人、至今亦后来者的中医巨著。

本书的成书，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故事。

本书的原名是《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是1963年国家卫生部部级重点科研项目的成果。课题组长为姚荷生，成员为潘佛巖和廖家兴。

在该科研项目立题前的1958年，姚荷生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提出的“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号召，凭借手头极其有限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献研究性质的长论文——《脏象学说的研究·肺脏》（约2万余字）。1959年为了向新中国国庆10周年献礼，姚荷生花了半年多执笔撰写，初稿完成后又与潘佛巖共同讨论修改，最后完成定稿《脏象学说的研究·肝脏》（约3万余字），并获卫生部奖（何种奖项笔者已记忆不清）。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1961年姚荷生向国家卫生部申报了部级重点科研项目——“脏象学说的文献研究”。1963年初，由国家卫生部立题拨款，经当时中南区（当年江西省行政划归中南区管辖）卫生部转给江西省，该项研究才正式启动。1965年初，就完成了《脾脏（包括肾脏）》，并于当年3月1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西分院”内部铅印成单行本，取名为《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脾脏》（见书后“彩照I”。以下简称《脾脏》），发至“中医研究院”及全国多省“中医药研究所”（在笔者的记忆中就有上海、浙江、湖南等省）。这

本由姚荷生设计并选定书目、潘佛巖与廖家兴及姚荷生选摘、再由潘佛巖为主廖家兴辅助执笔撰写、最后由姚荷生修改审定的《脾脏》，在中医各研究单位内部获得的好评如潮。

在《脾脏》研究进行的同时，姚荷生已将《肾脏》研究方法与流程初步设计完成，在修改《脾脏》及获悉同行评议后，他进一步完善了《肾脏》的设计。由于在《脾脏》研究工作中取得了经验，加之设计更为合理，故《肾脏》的研究仅一年即已初步定稿，而且姚荷生对其中的“命门的实质”进行了二次收集文献、研究分析、重作结论和改稿定稿的工作。较之《脾脏》，《肾脏（包括膀胱腑）》的研究的系统度、严谨度、创新性、实用性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肾脏》的研究过程中，姚荷生已将《心脏（包括小肠腑、心包脏、三焦腑）》研究设计完成；同时将在作《脾脏》与《肾脏》研究时收集到的心脏、小肠、心包、三焦卡片分类完毕。在姚荷生修订《肾脏》研究结论的同时，潘佛巖与廖家兴又按课题设计补充收集了这四脏腑的文献，并补摘和充实了原有分类卡片，共获得 24 万余张资料卡。正在姚荷生联系内部刊印《肾脏》和潘廖二人准备执笔撰写《心脏》时，同时三人还雄心勃勃想重写《肺脏》与《肝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厄运也就降临到该项研究及姚、潘、廖三人头上了！

“文化大革命”之初，江西中医药研究所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指责该研究为“封、资、修”的代表，是“钻故纸堆”。姚、潘、廖三人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冲击，尤其是在 1958 年被划为“极右分子”、1962 年后政治上为“摘帽右派”的姚荷生，终因此项科研项目在“文革”被划归为“三查对象”，遭到了抄家、批斗和体罚，关进了“牛棚”改造并失去人身自由。在被管、关、斗及其“暂时回家”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十分心悬于《脏象研究》资料是否被毁。在打倒“四人帮”后，他多次要求追查和找回这批资料，但因“江西中医药研究所”已在“文革”被撤销而无果。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担任江西中医学院院长姚荷生派人到已合并到江西省中医院的原中研所库房查找，并追询当事人，仍一无所获。家父姚荷生生前为此事不知几回嗟叹，几回伤心。直到 2009 年暑假，我带领弟妹到原中研所资料室及其废资料堆中翻找，亦同样结果。就这样，不但原来的图书所剩无几，且大量的研究资料、卡片、初稿等等，均荡然无存。

1977 年以后，《脏象研究》却又是另一番境遇。首先，《脾脏》几度被近乎整本的剽窃，而且剽窃者均获得了名誉、地位或金钱方面的好处。另外，《肾脏》的最后手稿则于 1977 年，被当时与姚荷生同一单位的《新医药资料》杂志编辑部





的一位编辑要去,理由是“考虑是否能在《新医药资料》上出专辑”。数月之后,在其他事件的影响下,这位编辑只好临时请江西中医学院严子藩老师在《肾脏》的原稿之前加了一篇几千字的“肾脏学说源流”,匆匆忙忙于1978年3月出了一本《新医药资料·肾脏专辑》。由于该专辑只在“前言”中简单提到了《肾脏研究》原属姚、潘、廖三人合作研究写成,而所谓“专辑”既无论文的名称,更无书名,亦未署名作者,故从此该项研究巨篇论文,彻底变成了“无主”之作。同时,由于刊印出版此书的目的似非为了传播知识,所以从排版→铅印→出版,既没有“清样”,也未经一次校对,里面的文字至少有几千处错误(见书后“彩照Ⅱ”),甚至整段整段地漏印。姚荷生“有幸”收到一本《新医药资料》的肾脏专辑,展卷一看,未署作者,经过“文革”而大难不死的他只好苦笑;继看内容,眉头则越皱越紧:不但文中错误迭出,而且他常常看不懂自己执笔定稿的文章!悲愤之情致使他掩卷仰天长叹!第二天,年近七旬的他就将《肾脏》原稿“借来”,在女儿姚芷龄的协助下,亲自伏案逐字逐句、逐段逐页地校改《新医药资料》的铅印文章,一直改到1980年6月18日才改完(见书后“彩照Ⅱ”),这才为我们这一次整理《肾脏》留下了宝贵的底稿,因为《肾脏》原稿和姚老亲笔校正的铅印文章被姚老“交回去了”,至今都毫无踪影。

2009年,我们江西中医学院姚荷生研究室成立,并在第一时间开始着手整理《脾脏》与《肾脏》。由于《脾脏》保留了原铅印稿,内中错误甚少,所以我们只作了两遍校对,即行付梓。然而,我们在校对《肾脏》时却发现,姚老在1978年时到底已年近古稀,面对《新医药资料》所造成的《肾脏》中的数千处错误,漏校之处亦复不少。为了维护学术的严谨与求真,为了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光大,为了对姚老等三位作者负责并还他们一个清白,我室组织了11位研究员,并召集了46位在读研究生,搜集了445种《肾脏》中引用的典籍与文献(其中有不少孤本、善本、稀有文献),遍访了5个省市8个图书馆,整理校正了12遍,故前后达十二稿,历时19个月,除了原稿有6处引文未查找到因而未校正外,其余均已校正并整理完毕。

《肾脏》的整理工作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

一、校正书中从文献中索引出的所有原文,并出校记。

二、校正书中索引原文的文献名称及作者名字;或补充作者姓名;或补充注明该句引文的出处(卷数、篇名、或章节页数、版本)。

三、对非原文索引的《新医药资料》刊印的所有文字,着重从传统中医理论的角度进行审查并慎重修改,必要时适当润色其文句,更正其错用的

标点符号。

四、遵照姚荷生生前对我谈过的意见,将他执笔撰写并经潘、廖二位同意的“命门考”列入正文,以取代初稿中的“命门的实质探索”;同时,将扼要说明“命门考”的“命门考的自我鉴定”置于“命门考”之前,以便于读者理解“命门考”。另外,笔者考虑到初稿中的“命门的实质探索”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列出来更可以看出本书定稿后的理论独到之处,所以,又将“命门的实质探索”的原文置于《肾脏》最后作为附篇。

一本书,整理校正历十二遍,也实属难得,亦当深感慰藉。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遍查相关文献时,无意之中又发现一本全部剽窃《肾脏》的书,还是所谓“国家级”研究院的人!当然,毫不足怪而又令人掩面的是,这位“君子”的“著作”,文献引文的错误也与《新医药资料》毫无二致,呜呼!

是为“代前言”。

六十七岁老人姚梅龄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前言补记

在《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脾脏、肝脏》即将付梓的前夕，我室研究员何秉儒发现了底稿已遗失多年的《脏象学说在诊断应用上的文献探讨·肺脏》一书的文字内容。失而复得，不亦快哉！自此，我才回想起1965年第一次见到该文，我父亲给我看的却是他用稿纸亲笔手写的正稿。由于当时我刚升进大学四年级，故他重点向我讲述了他对“肺为娇脏”的看法，并讲述了他经治的肺脏各种病症的实际案例。我大致记得，他当时还讲过：《脏象学说研究》中的《肝脏》和《肺脏》，虽然不乏创见和独到的研究心得，甚至可以说较任何一部收集、整理或研究有关脏象学说的文献都要全面些，但是，从中医药学必须“全面挖掘和系统整理提高”的基本要求来看，这样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强调指出，我们还必须老老实实，从广博的历代及现代文献中，以及结合临床众多实案的事实，来客观收集、梳理、分析、评判、研究和发展“脏象学说”。

有鉴于此，他与潘、廖两位先生从文献上着手研究《脾脏》、《肾脏》和《心脏》，并打算完成了《心脏》以后，重新从系统研究文献的角度重写《肝脏》与《脾脏》。可惜“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他的希望。现在，我和同事将三位老先生的遗稿合并整理出版，也只好将《肺脏》与《肝脏》书名最后“初步探讨”四字，统一定为“文献探讨”四字。

姚梅龄补记

2013年8月7日